

戰時民眾叢書
國民救亡政治知識

傅于琛著



黎明書局版

馮法主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再版

戰時民衆叢書
國民救亡政治知識

版 權
 黎 明
 書 局
 所 有

每册實價一角

著 者 傅 于 琛

主 編 者 馮 和 法

發 行 者 徐 毓 源

經 售 處 黎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黎明書局發行

北平 南京 開封 安慶 成都

佩文齋書莊
 中南文書店
 豫都文書莊
 景文書局
 普益書局

廣州 濟南 保定 西安 南寧

共和書局
 東方書社
 東隸書局
 大夏書局

天津 杭州 南昌 重慶 無錫

會友書局
 武林書局
 武林書房
 掃葉山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均有代售

緣 起

長期抗戰勝利的基礎是在動員廣大的民衆，欲使民衆發生巨大的力量，必須組織與訓練。抗戰發生後，有許多新的現象，後方民衆沒有清楚的認識，有許多切身的問題，後方民衆沒有妥當的解決，因對抗戰中各種現象認識不足，難免發生動搖；因對切身問題無法解決，更易陷於苦悶。長期抗戰中，後方民衆需要行動上切實的指導，同時在認識上更需要理論的解答。

本叢書的發刊，就是爲了上述的目的。我們想使後方民衆，對於戰時各種問題，得有較正確的「理論」上的認識，以堅定他們對於抗戰的信仰；進而予以行動上「實際」的指導。使他們的力量有效的發揮出來。我們重視實際，也

重視理論，實際與理論是分不開的同一東西。

這本叢書的撰著人多是對於各該問題的專門研究者、與在抗戰工作中實際從事者。我們不敢說本叢書怎樣完善，但他們的經驗心得是可重視的。本叢書的讀者是以內地知識青年、一般的新給者、及參加救亡工作的人員爲主要對象。本叢書的內容對於實際的需要難免尙有脫節的地方，希望各方面予以指教。

馮和法

引言

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政治路線，是要中國人做亡國奴。它的辦法，是『以華制華』，使中國政府與國民不能合作，使中央與地方永遠分崩離析，殘破不堪。簡單說來，這就是使中國整個的政治機構破產，使國民無所歸依。

因此，我們在全民救亡的運動中，發揚國民救亡的政治知識，是一件很迫切的問題。但是，我們大家都忙於緊急的救亡工作，沒有閒情逸致的工夫，去研究厚本的政治理論，更不需要學究式的沒有消化於實際問題的陳腐理論。所以，我們只有抓緊現實的主要問題，來展開基本的政治知識。換句話說，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是實踐的理論，為的是要拿來武裝國民的救亡戰線。

我們在救亡運動中所最切要的政治知識，是要人人了解『國民與國家』的基本關係，『國民的責任』，及如何提高國民的水準，以達到『大眾的領袖』的前進的境地，以便造成人人用最大努力，完成保衛國家的任務。但是，這不是叫所有的國民忙亂起來，而是要依照科學的政治理論，有計劃的，合乎社會法則的『總動員』起來，才可以保證全民救亡的勝利。不僅如此，我們不應該孤獨地，或唯我獨尊的誇大，或盲目的蠻幹，憑任感情，幹一些『打倒東洋人』的『民族復仇』行爲。因爲，這種沒有認識敵人的真面目及其在世界上的真實關係，必然會引起我們陷於盲目的失敗。所以，我們必須把『中國救亡的政治戰線』與『世界政治』的關係，抓實在。然後，我們就可以從『國民』、『國家』乃至『世界』的正確觀點上，運用一切政治知識，在全民救亡抗戰的偉大使命中，打倒

日本帝國主義！

在這本小冊子中，一共五章，是根據上面所說的要旨寫出來的。希望一切同志們，不客氣的在行動和理論上給予指正！

目次

引言

一 國民與國家·····	一
一 國民意識的武裝·····	二
二 國民與國家之間的基本關係·····	五
三 發展的國家與活生生的國民·····	八
二 國家興亡人人有責·····	一三
一 不前進就要退後·····	一三
二 怎樣盡國民應有的責任？·····	一八
三 從那裏做起？怎樣做？·····	二二
三 國民大眾與領袖·····	二五

一	獨裁、民主與領袖問題	二七
二	領袖與大眾	三〇
三	領袖的形成	三四
四	領袖的成敗	三七
四	全民救亡抗戰的總動員	四〇
一	總動員的意義與內容	四〇
二	怎樣鞏固統一戰線？	四五
五	全民救亡的戰爭與世界和平運動	四九
一	戰爭呢？和平呢？	五〇
二	對於曲解戰爭與和平的理論的檢討	五三
三	救亡抗戰就是爭取澈底的世界和平	五七

一 國民與國家

要想不做亡國奴，必須要有一個國家來保護自己。要有國家來保護自己，首先就需要自己是一個健全的國民。這是人類自有國家的制度出現以來，所不可避免的一種政治現象。雖然，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機構和成份很複雜。在許多國家之內，有各色各樣的情形不同，內部的矛盾關係，異常的錯綜複雜的事實。但是，不問什麼樣的國家，一旦把國家被侵略者滅亡以後，不用說廣大的人民，要做亡國奴。而且，一切特權者，投機取巧者，乃至平日專於賣國求榮的賣國賊，也要因亡國而無所憑依了。

在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緊急時代，我們每一國民的主要天職，就是要

「保衛祖國」！惟有大家起來担负救亡工作，才可以免除民族的滅亡，才可以爭取生存權和自由平等權。因此，做一個健全的國民，最基本的，是要弄清楚國民與國家的關係！

一 國民意識的武裝

國民與國家有什麼關係？國民在國家中佔有怎樣的地位？國家對於國民有什麼作用？……這些問題，在日常各色各樣的著作和演講中，不知道有過多少回被人提出來，也不知道有過多少不同的見解。假如我們離開國民的切身利益，打算在這裏對於各種見解，一一爭論一番長短，或企圖規定出一個出風頭的定義來，似乎不必要。因爲，憑空討論這個問題，很容易犯着學究式的自欺欺人的毛病；結果，不免要跟一般要人坐在飛機上調查人民的災荒苦疾一樣，不

一定能夠得着要領，反而有『清談誤國』的危險。這種官僚式或學究式的把戲，不僅任何普通公民做不來，而且也是一般國民所認為頭痛的事情。

在普通國民受着封建愚民政策『洗禮』的時候，大半爲『休談國事』或『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格言』所影響，而以『潔身自好』的哲理，來對國家大事，取一種消極態度。這種態度，在現代民主國家是不歡迎的；尤其在國難危急的中國，更需要每個同胞都要具備着國民意識的武裝，擔負起挽救國家危亡的責任。因此，凡是國民，明確地認識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真實關係，成爲當前最迫切的事情。

說也奇怪！現今有一些人，只顧私利，不知國家的安危，是決定他們自己生死存亡的關鍵。他們也許是安於局部的穩定生活，以及在敵人面前討名利的東西，忘記了國家的存亡危急。這好像一種人，不理解大火延燒村舍，會使自

己家室遭到燬滅的厄運；甚而還有以救火爲職業的人，願意大火延燒到本村，妄想獨自生意興旺；簡直是可笑的現象。老實說：現今中國的一部份利己主義者，不肯積極地負責救國，甚而還有甘心替侵略者辦理公事，充當漢奸或貪官污吏的，便是如此以絕對自私態度，對國事『裝聾作啞』，甚而有意無意地出賣國家利益。這些可怕的亡國份子，可以說是^最不理解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重大關係的。他們跟一部份『否認國家存在』的烏托邦，及夢想『馬上實行社會革命』的空談者一樣；同是生活在現實的國家垂危的弱小民族社會中，跟機器一樣，死板板地，只想著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私利，而不顧及國家民族團結抗敵的重要性。這簡直就像醉生夢死的人，儘管睡在床上幻想升上天堂或遊遊地獄。但實際上仍舊是不安定地睡眠着，不知道亡國大禍的火，已經燒到床頭來了。

所以，當着中國民族危機緊急的時候，國民的第一要務，是掃除一切偏

見，武裝國民的意識，使每一同胞，都認清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正確關係，使每一同胞，明白自己在民族救亡的生存綫上，是國家的主人。這不僅是擯除奸賊、消滅內亂和保障救亡勝利的唯一條件，也是創造遠大幸福文化的唯一條件。

二 國民與國家之間的基本關係

自從歷史上出現了國家以來，它根本就不是什麼神祕不可思議的東西，僅僅是人類社會生活關係中所產生出來的政治關係的具體表現。人民生活行為的安危，反映着國家的基本構成關係——領土、主權、法令等的效用和價值。國家的存亡關係，顯然是全體國民在「自由人」與「亡國奴」之間的分水嶺。所以，普通公民以正常的權利，研究國家大事或發表關於國事的意見和發動行動，成

爲國家行使主權的指南針，有判斷國內一切設施是否妥當，及加強並確定國際地位的決定作用。

爲要證明這個道理，一九三六年西南問題及西安事變的解決，就是頂好的例證。那兩次事件，都曾經有逼起內戰的危險，當時，虎視眈眈的日本帝國主義，更乘機變本加厲，一方面勾結漢奸造謠，挑撥、離間，同時更積極派兵進攻我們。敵人那種兇惡奸滑的姿勢，就好像要張起大嘴，恨不得一口把中國吞滅下去似的。可是，當時四億五千萬同胞，感覺到民族生死關頭了，大家都放棄了一切利害衝突的成見，異口同聲地，警告野心家『停止內戰』，呼籲『全國上下四方，集中力量，抵抗侵略者』。結果，由於中央政府及各地方當局體察民意，內戰的危機，才暫時解除。跟着又展開了綏遠抗敵的神聖戰爭，繼後，中國政治上的和平統一，一躍而進入了新的階段。但要知道：這一新的

和平綏一的客觀條件，決不是什麼所禱燒香的結果，也不是經濟生活正常發展的結果。而是由於全民族的自覺『反內戰』熱誠，和擁護國家領袖與國民在民族的生存線上『統一國力，收復領土主權』的結果。這種國民勢力的怒吼，曾經使得英、法、美、及蘇聯各國向來認『中國的內亂頻仍』的輿論，一變而為『中國統一抵抗侵略，足以安定遠東和平』的讚美交響曲。至於侵略國的日寇方面，更是手忙足亂，不能不重新考慮『對華政策』，竟然使那一副軍國主義的政治的機構，暫時難以向中國前進，陷入了越發瀕於爆炸的境地。

這些事實，說明了現代國家的主人公，是全體國民，在全體國民中，各個國民的工作、生活與自由權，成爲決定國家動向的主要因素。全體國民中的優秀份子，唯有應着大家的切膚要求，在國民公認的正確辦法之下，才可以施展他們的政治、天才，表現他們的人格，爲民族謀利益，掌握國家的樞紐，對國

民負責任。因此，從國家的觀點看來，雖然一切個人之間，有着工作和生活條件上的差別性，如政治、軍事、教育、文化、工、農、商、學等，或高低懸殊，甚而互相矛盾的地位。可是，一切個人之間的共通性，在保持民族生存及改善國家境遇的要求上，是不可分割的。尤其在現今中國民族危亡的關頭上，人人都有『爭求民族解放』超過『個人私心或某種集團利益』的覺悟觀念，想把中華民國組織成摧毀侵略國鐵腕的有機體——一個征服惡魔的巨人！

三 發展的國家與活生生的國民

在全民救亡的關頭上，保障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意義，誠然足以團結一切國民，增大國勢，並加強政府領袖執行內政外交的威望。可是，這種情形，決不像宗教家所想像的，國家和政府昇騰到了跟上帝一樣不可摸捉的地位；也不

像流俗學者所比喻，國家政府及人民好像戲場內的演員明星與觀衆那般單純的關係。因爲，如果不把握着國家所包含的活生生的個人的總體，同時也就不會理解政府對於國家大局及國民的措施，也就不能夠隨時改革自己的缺點，精益求精的進步。那麼國家的發展，也就無從說起。這種對於國家與人民，作靜止地或虛懸地觀察法，時常會把國家看成一種空洞的架子，或神祕不可思議的東西。結果，人們雖是在愚魯地「愛國」，但客觀上却在「害國」，終於有統治者及被統治者同歸於盡的危險。滿清專制國家的崩潰，及希臘羅馬奴隸國家的滅亡，就是人民及奴隸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與自己的責任，以致無力以活生生的行爲，促進國家發展的自然結果。

歷史證實的進化法則告訴我們：發展的國家，都是由人民集中力量，掃除了國內社會幸福的障礙者及國外侵略者的結果。精明的國家領袖和官吏，

成爲領導全局的司機人，可以被人民擁戴到最後勝利的象牙塔上。同時，一切阻礙國家發展的奸賊：因爲是在向歷史開倒車，阻擋人類新史的發展，結果總是被淹沒到了悲哀的坟墓裏。一七九三年法皇路易十六因勾結俄、普、奧三國，出賣民族利益，而被民衆請上「斷頭台」；一九一七年俄國沙皇在人民要求「麵包與和平」的怒吼聲中，被迫「退位」；民國初年袁世凱賣國求榮的結果，弄得「憂憤而死」……這些都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爲活生生的民衆所遺棄的犧牲者。當然，這些開倒車的英雄的末路，並不是孤獨的，而是由野蠻軍閥貪官污吏及少數剝削者或時代落伍者，所陪伴着的——他們畢竟是憑着一點兒特殊的權勢和私利，永遠在國家發展史的悲劇中，留給後人憑弔罷了。

從國家的發展上看來，目前中國的趨勢，是相當的樂觀的：第一，中國國民自「九·一八」以來，在敵人與漢奸夾攻中，迅速地覺悟到每一個人都必須爲

民族國家担負一份救亡的責任。譬如，一九三六年綏遠抗戰中的募捐助戰運動，及慶祝和平，歡迎蔣委員長離陝回京主持救國大計的運動，已經夠使敵人和漢奸驚震，不能不承認中國國民活力的偉大。尤其是今年七月七日華北發動抗戰，「八·一三」展開全面戰以來，完全說明了中國國民的偉大活潑的力量。

第二，中國的大部份中央及地方政府領袖，大多數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在和平團結與『爲公忘私』的許多精誠互助的現象中，中國民族解放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石，可以由四億五千萬同胞，推動它們到收復領土主權與完成國家獨立的境地。

第三，中國民族救亡勢力集中的結果，一方面使少數私心的軍閥，官僚及機會主義者陰謀家的醜態，愈加無法掩飾，同時，更使滿蒙以至全中國的漢奸的保護色，愈加容易判斷。這是民族團結力量的測量表，除奸抗敵工作的照妖鏡。這種中國內在國力的發展，同時就有逼迫以侵略爲主的國際侵略機構，越

發恐慌的作用。這是中國從敵人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前夜的佈景，也就是中國一切國民將要由國內取得平等自由，而與世界人類同享平等自由的新曙光！

二 國家興亡人人有責

凡是了解國民與國家的基本關係的人，就不會把國家大事的責任，拋在一邊不管。不然，他就曾放棄國家興亡的責任，也就是否定了自己做國民的天職！

一 不前進就要退後

時間在一秒一分的過去；世界在瞬息不斷地變化。從前的歷史是這樣流動着的；今後還是不停留地發展着的，一個人、一個民族、以及全世界的人類，沒有靜止的自由，不前進就要退後，別無他路可走。這種原則，在一

個人的生活與事業上，表現得最清楚；在一個國家的興亡關頭上，表現得更嚴重。

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上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被廣大的人類創造着，好像是偉大的河流，愈往下面發展，就愈是廣大而深沉。這是任何民族都共同生活着的方向。只是，由於各種經濟條件及政治制度，不平衡的發展，在世界各國中，有先進與後進的分別，有侵略者與和平者的分別，有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的分別。世界各國的衝突或聯合，根本原因在於各國內部政治經濟機構的矛盾或統一性。民主國家，法西斯蒂國家，弱小民族國家，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所形成各種國際局勢，乃至世界戰爭的危機的形成，決不是少數人物規定的，也不是漫無頭緒地佈置着的。在一切國際關係的基點上，都反映着各國國民的生活方式，與政府當局所施行的內政外交政策的本質。而且，內政

外交的成敗，決定着全體國民的生存利害。全體國民，事實上成爲一國內政外交的基礎。

所以，國家興亡，人人有責，這一句話，除了消極的說明：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之外，在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中，它有着全民抗戰的積極性的內容。猶如沒有四億五千萬同胞就沒有中華民國一樣；沒有集合千百萬同胞的力量，阻止侵略國的進攻，國防前綫是沒有保障的。特別是抗日戰爭緊急的時候，沒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武裝起來持久的抵抗日寇，侵略者的大禍一定是愈來愈嚴重的。

回憶自『九·一八』以來，侵略國的軍隊，特務機關，情報機關，浪人漢奸團體，從東北、內蒙、華北、一直到了華中、華南；私貨偽鈔及各種偽組織，像夏天的臭蟲一樣，多得不可以數計。所謂『經濟合作』與『文化提攜』，

隱藏着侵略國軍事陰謀。張允榮等漢奸主持的所謂中日合辦的惠通航空公司，是敵人的軍用飛機的活動地盤。天津、青島的日本瓦斯公司，製造着殺人的利器。冀察的各種公路建設，龍烟鑛場的復工與滄石鐵路的建設，是敵人企圖發展軍事的主要手段。大沽口及白河被友邦疏濬的結果，已經設置了海底電線，直達東京、大連，而且可以通行巨大的軍艦……這些把戲，都是日寇用和平的陰謀進行的。幾年來對日遷就因循的結果，亡國滅種的危機，瞬息不斷地增加；國土主權或明或暗的淪亡；民族經濟及國民的生存線，不斷地被人摧殘着。這些事實急速地發展，說明了：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敵人由滿洲、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不斷的進攻，弄到現在，居然用整個軍力來『征服中國』。很顯然的，民族國家的命運，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不前進就要後退，準備死亡；一切『遷就』和『應付』，都包藏了無限的禍患。唯有集合全國上

下四方的人力、財力、政治力、軍力、以及思想力，掃除亡國危機，展開中華民族生存的大路，才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任務！在這民族復興的神聖任務之前，包含着四億五千萬同胞的生動的積極的進步意義，它對於一切腐化的、頹廢的、依賴性的、投降的勢力，具備着掃蕩的權威。這種趨勢，是「九一八」以來經許多事實證實了的。所以我們不能因中國的內部組織與對外政策還沒有澈底收復領土主權的積極表現。因而感到「懷疑」或「消極」。因為，那簡直是將自己置身於民族國家立場之外的愚笨思想。

反之，我們每一個國民，在自己應有的神聖天職上，應該積極地推動一切同胞，督促民衆組織以及政府機構，担負起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因此，如臬認清楚了全民救亡的任務，是每一個中國大國民自己的神聖事業；那就應該隨時隨地，積極的、毫無成見的、戰鬥的，負起國民救亡的任務，打倒日寇，

二 怎樣盡國民應有的責任？

怎樣盡國民應有的責任？這一個問題，如果抽象的說來，包括着許多的意思。在時代與國體不同的環境中，它有極不相同的意義：有時教人徬徨；有時教人墮落；有時教人創造偉大的歷史。

代表希臘奴隸國家的政治思想家柏拉圖 (Plato 427—347 B.C.)，主張：「統治國家大權的是哲學家；保護國家和人民的是戰士；供給物質需要的是勞動者。」根據這種主張，國民對於國家，好像是只有固定被統治的地位，不可變更；尤其對於廣大的奴隸階層的自由與主權及生活的保障問題，簡直毫不關心。因此，這種主張，不僅沒有改善希臘的國家，使它解放平民和奴隸，反而

隨著希臘歷史的滅亡，而成爲政治思想史上的反動理論。這就是歷史上忽視了人類的能動力，而把國家看爲『超人類社會組織』的墮落理論。其次，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之下，所謂『朕卽國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思想，把人民規定成被動的馴服的『臣民』，主張『朝廷保護人民；人民效忠於國君』。其實這樣的歷史，早已被近代文明把它送到歷史博物館去了。因爲，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自由平等』的要求，構成了民主主義的原則，成爲發展民族國家的主要信號。

我們必須特別研究的，是在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國家，在民族解放的神聖任務上，沒有粉碎一切封建專制的和外力的束縛關係，是不能夠展開進步的歷史，而取得最後勝利的。十八世紀北美合衆國的解放，歐戰後土耳其的復興，都是很明顯的例子。而且，最明顯的，我們還可以引爲證明的，就是蘇聯在一

九一七年十月的勝利，要是沒有一九零五年的民主革命，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把中產階層及農奴解放出來，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提到『怎樣盡國民應有的責任』時，首先必須要掃除歷史上否定了的奴隸制度及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思想；必須要繼續貫徹辛亥革命以來的『民權民族』運動的神聖使命。

這種偉大的革命使命，自清末孫中山先生創始以來，在宣傳上和實際運動上，經過了許多的奮鬥。這是民國二十幾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的特點。可是，由於殘餘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的進攻，逐漸把中國推到殖民地化的危亡境地，使『民權，民族』運動，至今沒有完全成功。加以日寇滅亡中國的政策，得寸進尺地威脅着『民權民族』的解放運動，更縮短了我們革命的戰線，逼起大家臨到了民族生死的『最後的關頭』！近年來，敵人的『王道思想』，從滿洲、內蒙、

一直伸入了華北、華中、華南。漢奸們附和着敵人，在北方製造了許多『邪教』。從偽裝的各種宗教團體，乃至內蒙、華北各種傀儡式的『防共會議』，都是愚弄中國人民，使大家放棄國民救亡的思想和責任的毒計。而且，漢奸們更誇大的一切復古運動，配合着敵人『滅華』的政策，根本企圖打破『國家興亡，人人有責』的神聖信念，企圖驅逐四億五千萬同胞，投到『天皇萬世一統』的黑暗世界；這便是侵略國在政治上，驅使中國人變成殖民地奴隸的戰術！

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用全副軍力來滅亡中國，他第一不許中國的中央與地方統一；第二不許中國人民與政府合作，第三不許各黨各派各階層的聯合。他一貫的要求，是要製造許多個漢奸傀儡政權，以實行『奴化全中國』。所以，我們目前提出來說：『國民應有的責任』，根本不是抽象的、奴隸式的、或封建專制式的愚民政策的說教；剛巧相反，它正是充滿了血肉的全民積極自

主，爲爭取獨立民主共和國，擺脫侵略者的鎖鏈！

三 從那裏做起？怎樣做？

那末，我們從那裏做起呢？怎樣做呢？

這是一種簡單明瞭，而易於實行的事情。我們以爲：最好是不必以訓令方式，教人一定從那裏做起；也不必刻板地教人怎樣做，因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環境和地位，他在亡國大禍的威脅之下，有他自己的痛苦和認識，因而有他的覺悟和要求。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只有起來担負救亡的責任，奮鬥才是生路。我們不怕失敗，失敗就是成功之母。繼續不斷的努力，將使一切不同環境的同志們，到一條大路上，配合着，繼續不斷的爭取勝利。譬如東北的義勇軍，自「九一八」以來，它的聲勢日益浩大，力量有加無己的擴充。雖有馬占山、

蘇炳文、李杜等將軍失敗於前，而鄧鐵梅等英雄，又被殺於後。但東北義勇軍的數量和質量，却數年如一日的加速地進步着。後起的份子，雖然也有少數是由內地出關的志士，但主要地人物，畢竟還是當地的農民、工人、破產的工、商、學界、兵士、軍官。而且，這些鋼鐵般的戰士，決不是空洞理論製造出來的，完全是敵人刺刀與槍炮逼迫到一塊的。歷史決定了的，與東北義勇軍一齊殺敵的陣線，一天天的擴大；到現在，已經發展爲全民的或全面的抗日大戰爭了。這是由於國民從自己做起，配合着整個民族革命的偉大的發展！

最後，關於怎樣做的問題，我們認爲：第一是組織要上下四方的發動起來，造成普遍堅固的統一陣線；第二是宣傳和理論要統一、切實；第三是工作要深入，擴大在羣衆的基礎上。惟有這樣，才可以達到全民族統一救亡的總動員。我們相信，萬衆一心的團結起來，堅決的抵抗日寇，爭取最後的勝利是毫

無疑義的！

三 國民大眾與領袖

只要我們不把國家看成神祕不可思議的東西，不把國民看成完全被動的或死笨的東西。那麼，在國家中負有重大責任的領袖，自然就是人人所理解的。從前，在許多黑暗專制的國度裏，每每把皇帝、元首或最高的統治者，弄成人民認識不清楚的神化怪物。譬如『天子』，在古時就是指的皇帝，認為是『上天的兒子』。這是中國人在封建專制時代，對於國家元首的神祕說法。再如『王權神授』，這是中世紀各歐洲封建國家，解釋國家最高統治者的說法。這些說法，有一個主要的根據，就是不肯把當時那種專制魔王的真象曝露出來，用神祕的說法，掩飾着國家統治者壓迫和欺騙的作用。以這種思想，在於讓那班封建

地主貴族，或軍閥官僚們壓迫人民的行爲，都可以隱藏於「天」或「神」的玄妙之中。但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在現今科學倡明，打破迷信的時代，特別是民權主義隨着社會經濟的自由平等原則而展開以來，一切國家的元首，總統或領袖，都已成爲大部份國民所不奇怪的民衆首領或代表。這種國民大衆的代表或首領，當他所代表的國民利益較少時，只有少數人擁護；當他代表廣大民衆利益時，就爲大衆所擁護。現代各國的政治家或黨派的領袖，便是最顯的例子。

因此，我們做國民的人，對於國家以內乃至世界上的領袖人物，不但不應該奇怪或畏懼，或敬而遠之，而且應該從自己的利害立場，去判斷他們的作爲，以便估計自己在政治上與他們的關係。如果，自己是一個很健全的國民，爲了盡自己的天職，爲了民族國家的解放，爲了社會乃至世界的幸福而革命，或

創造文化福利。那麼，他的行動就不能直接間接地決定着國內外政治大事的方向。換句話說，一個國民，可以做一個普通人，同時也可以做一個國家內，乃至全世界上的領袖人物。問題就只是要看自己是不是在政治上代表廣大國民的利益。這可以說是一般的政治知識，沒有什麼稀奇。根據這種一般的政治知識，我們來看中國全民救亡運動中的領袖問題，可以使我們有許多的好處：第一是免得盲從；第二是不受欺騙；第三是自己也應該努力發展所有的天才，為救亡運動而奮鬥，可能創造成爲一個偉大的領袖；第四是自己會因此以極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去督促同志或擁護自己的領袖，而打倒賣國賊的領袖。

關於領袖的問題，我們可以分別成幾方面來依次的討論下去。

一 獨裁、民主與領袖問題

數年以來，中國的政局與思想，在「和平統一」「收復失地」的迫切要求中，逐漸地向民主政治的目標發展着。最近，當大家討論到怎樣實行民主政治的時候，有些人担心的說：『假如實行民主政治，一切的人民或政治團體，都參加政權，使領袖權力渙散，豈不弄得羣龍無首，終歸回到一盤散沙的、封建的、或分裂的局面嗎？』

這種主張，表面上似乎是關心中國的團結，主張集中國力，統一政權，特別注重領袖的重要性。其實，這種見解，正是輕視偉大的領袖，而且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意義。我們知道，盲目地崇拜領袖與奴隸性的順從，惟有在封建的專制王國及現代法西斯國家中，才找得到。把領袖的概念，定為絕對統制，強迫服從，武力鎮壓及禁絕民意的表示，那是獨裁主義及愚民政策的綜合。試問：離開社會及人民大眾的生存與自由關係，只幹着一呼百應的霸道的

表演，在刺刀槍砲的包圍中，自命爲領袖的獨裁者，就算是領袖嗎？除此以外，那千百萬人民的心血交流所熱誠擁戴着的革命家，未必就不算是領袖嗎？人們未必只看見滿清末年的溥儀皇帝，是大清帝國的領袖；難道把『辛亥革命』當時的民衆所擁戴的孫中山先生，不算是領袖嗎？所以，人們如果把領袖的概念，專用在少數特權者利益，限於統治者及橫強壓迫的專制帝王或法西斯獨裁者方面，而認爲民主運動或民主政治中沒有領袖存在的地位，那真是不但蔑視了國民常識，而且侮辱了領袖的偉大意義。

美國的羅斯福，代表着現階段勞資問題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的領袖。他絕無任何強暴橫蠻或強制人民的威力。他的計劃，時常受最高法院的裁判乃至否絕，但是，他的總統地位，依然獲得大多數反法西斯反戰的國民一再的擁護。而且這位民主政治的領袖，比較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所有的敬崇

者，要廣大而又真摯得多。這不是民主政治上的一位偉大領袖嗎？蘇聯新憲法實施後，人民獲得更真正的平等與自由，選舉法規定不記名的普選，一切勞動者，均有享受民權的地位和充當領袖的權利。然而斯他林的領袖地位，並不因此而稍微減色，反而在國內與國際獲得更被重視的榮譽與地位。這不是說明民主政治的領袖，比較獨裁者的狹小領袖，更偉大的事實嗎？

所以，事實指示我們：民主政治將要展開中國更偉大的時代；同時就注定了更偉大的領袖的出現。在中國全民救亡抗敵的和平統一過程中，鍛鍊出了許多的英雄偉人。在這中間，那最能把握全民利益，胸膛最寬大；態度最光明，見識最深遠，行爲最堅真勇敢持久，主張最正確的人物；就是最偉大的領袖！

二 領袖與大眾

從上面所說的，關於領袖的價值問題，可以知道，最多數人所擁戴的領袖，比較少數人所擁戴的領袖，要強而有力得多，偉大得多。可見，領袖的偉大或渺小程度，是由大眾所決定的。民國五年袁世凱包辦『國民投票』，想當皇帝，轉瞬就被民衆唾棄，以致「幽憤而死」。「九一八」以後，日本軍閥浪人，擅立溥儀爲偽國的皇帝；溥儀不僅因此成爲四億五千萬中國同胞，所痛恨恥笑的漢奸，而且成爲世界所公認的傀儡皇帝。這可見與民衆相反的領袖，不論在金錢與槍炮的擁戴之下，總是笑話的東西。

巴比塞說：「一個領袖的需要大眾，比大眾的需要他更切。一個領袖應當了解大眾，比大眾的了解他更爲要緊」。這就是說，領袖不應該離開大眾，並且不應該違背大眾的合理要求。如果他要離開大眾，不了解大眾的合理要求。在大眾方面，自然只有乾脆地丟開這背叛他們的領袖，依照自己正常的目標做

下去。而且，在大衆中間，自然會由平凡生活的奮鬥，不斷地產生新的傑出的領袖出來。

歷史上有許多領袖，多半是從平凡的人，進步奮鬥出來的。印刷局學徒出身的福爾克林，裁縫師出身的林肯，醫生出身的孫中山，工人出身的斯他林，下級軍官出身的拿破崙，和尚出身的明太祖，……這些由平凡生活而變成領袖的人物，不僅是他們的經驗，能夠理解大衆的平凡生活，而且他們所奮鬥的目標，也在某種時勢與歷史大流中，與大衆的利益相一致。

所以，我們可以說：領袖的偉大，並不是什麼神祕的天才的成功，也不在於陰謀奸詐的勝利，更不在於武力的壓迫或金錢的收買；而是在於那個領袖的生活、事業與思想，溶化着大衆的生活、事業與思想。

如果說到領袖與普通人之間的分別，我們所以說：普通個人的合乎歷史法

則的要求，與創造人類文化的認識和實踐的綜合，便是構成那個時代的領袖的決定因素。偉大的領袖，他的言行事業，具廣大民衆的集體創作和全權代表。一切人都有變成領袖的可能，那就要看他們的主觀的努力與客觀環境的配合如何。

在民主原則下面，大衆的面前，時常產生並需要很多的領袖。他們在同一立場上，跟封建統治者的諸侯們不一樣，並不是互相利用或排斥的，也不是瞞上欺下的，而是互相補充、合作的。誰最能合作，最能溶化一切真理，體察大衆的公意，最能果斷英勇，最能持久努力的，便是最高的領袖。這最高的領袖，除在工作、責任及思想上，與其他的個別同志或次級領袖分工合作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神祕奧妙之點，所以，在真正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都平等的世界，領袖是人人可做，而且是人人互助努力征服自然，創造最高幸福的最高目

三 領袖的形成

有些人閒談到人生觀的時候，大半愛說：『我們知識有限，環境不好；時代不湊巧，我們不會有當什麼領袖的希望了。』其實，這種說明領袖之形成的見解，是不夠的，僅只說出了『時勢造英雄』的半面真理；而沒有理解另一方面『英雄造時勢』的真理。他們不知道兩者是不可分離的。歷史上有許多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決定着個人的生活。但一切歷史的創造，都在於人們的努力，要合乎客觀的必然法則。我們中國有過許多聰明才子，博覽萬卷書的學者。他們的家中富有順利的的生活條件，而生長又恰巧在需要偉大領袖的時候。但這些具備有製造為領袖的順利的客觀條件的人，除了少數有相當成就之外，

多數的却不能綜合運用那許多有利條件，跨在社會上幹一番大衆的事業。他們很多變成了風流鬼、書獃子、守財奴、乃至奸雄或驕奢淫佚的沒落的浪子。另一方面，事實却相反地，有許多平民的子弟，或境遇困難的青年，在困苦平凡的奮鬥中，却反而創造成了很多的英雄偉人。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不應該以「順境」或「逆境」來規定一個偉人的形成條件；而是以個人的努力，是否適應着新歷史的需要，是否運用夠了他週圍所有的可能社會條件。紀元前二世紀希臘人亞力山大·海龍，即已經發明了用蒸汽力轉動的器具。在那樣科學知識與技術程度幼稚的時代，有如此成功，比較近世的瓦特的發明蒸汽機，總算更爲出奇的事。可是，瓦特的發明，恰巧供給了產業革命的需要；而海龍的發明，僅供給小孩玩具的使用。社會主義的主張，早在紀元前數百年柏拉圖以前，及紀元年前後的原始基督教就有的。但社會主義的科學基礎，却在十九世

紀資本主義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才把它確立。而社會主義的實行成功，又在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崩潰時期的列寧、斯他林等領導下的蘇聯。遠在兩千多年前孟子的『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的思想，就主張民主政治。但實行民主政治的運動，却在近幾十年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到了民國以後的今天，才逐漸地在中國發生曙光。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在於把自身的努力，與社會條件及歷史上客觀的法則的綜合。領袖的形成，不過是那『綜合』的最能代表大衆的言行與組織者，努力的結果。

厄采說：『一個偉人，不單有着他自己的才智，他還有着他朋友的才智』。

這個意思，可以說是：偉人不是絕對超羣的孤獨的自負、自傲的，而是竭誠接受別人的才智的。紀德說：『偉大的思想家，從不畏忌影響，但却是飢渴着去找尋影響』。這可以說是：做一個偉大領袖的人，應該是渴望着了解大衆的思想。

想，乃至敵人的或反對派的思想。中國俗語所謂『萬衆一心』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話，正好引用爲偉大的領袖鍛鍊自己，集中大衆的力量，掃除或克服敵人，創造新中國的指南針。

四 領袖的成敗

歷史上有許多轟動一時的領袖，一躍而驚震「天下」。人們在不明真象的情形之下，每每造出多少神話，來說明所謂偉人的來歷。但仔細考查起來，一切在歷史上佔過一段領袖地位的人，沒有什麼奇怪，都有他們的出身、思想、工作及作用等關係所助成的；而且是投合於某種社會條件及民衆基礎的。項羽、拿破崙、洪秀全等，都是曾經由民衆的擁戴及自己英勇的努力，代表着一個社會勢力，或民族的自衛力量。可是，他們的失敗，却有各種不同的狀態：

項羽自刎於烏江；拿破崙被囚於聖赫勒拿島；洪秀全在清兵圍剿及太平天國內訌的最後時期自殺。這些領袖失敗的結果，自然表示着他們的計劃、行爲及思想的遭遇。但一般地說來，主要原因還是由於他們未能與當時社會條件的趨勢，相正確的配合，做到「恰到好處」的境地。項羽的失敗，由於不理解自己的羣衆。洪秀全的失敗，主要地是由於農民運動缺乏嚴密正確的綱領和組織力。拿破崙的失敗，是由於矚視了人民的民主要求，只想個人當皇帝。

可見，領袖的成敗，是由他的行爲、思想與大衆生活的關係決定的。歷史上有許多帝王及革命的英雄，最出風頭的時候，多半是他們跟民衆最能接近的時候。當他們被打倒或失敗的時候，大半是他們離開民衆的時候。

『一個領袖開始離開了大衆，去做他自己的小事情的時候，他完結了，無論在勝利上，利益上。』（巴比塞語）那麼，領袖應該怎樣克服這個弱點呢？烏

梁諾夫說：『唯有在偉大集團中，才能克服個人的弱點』。一個領袖的人格思想及行爲集團化和大眾化以後，他的作用就跟大眾在歷史上，佔着同樣偉大而又久遠的地位。反之，任何領袖的人格、思想及行爲自私化以後，他就迅速地狹少，並且衰落，以至於做一個普通大眾，都成問題。

我們希望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一切的同胞都能努力做偉大的領袖。更希望各黨派各民衆團體的領袖，都能在澈底的救亡運動中，發展自己的天才與人格！我們更希望現有的黨國領袖，永遠偉大的領導全民救亡，爭取最後勝利，而成爲創造新中國的領袖！

四 全民救亡抗戰的總動員

一 總動員的意義與內容

在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時候，全體國民，除了漢奸以外，都有起來担負救亡運動的神聖使命。蔣委員長對於這點，曾經指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這就是要發動民衆運動的基本原則。他跟着又說：『唯望我全國同胞，不論男女老幼，個個人貢獻能力，在中央領導之下，各盡責任，共同一致努力奮發！』具體點說，這就是：在抗日救亡的運動中，發動全民的、全面的戰爭，即所謂國家總動員的

意思。這總動員的內容，包括着集中『人力、財力、物力』的辦法；從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要偏配成與軍事抗戰相一致的組織。總括地說來，就是要政府與人民一致合作，地方與中央完全統一起來，爲抗戰而奮鬥到底。

誰也不能否認，這一個偉大的全民抗戰，是要將所有的國力集中起來。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第一，不是一句話，即可以完成的；第二，不是單靠少數人主張，即可以實行的，第三，即使大家起來了，也不是像數學上加一二三四變成爲一個總和，即可算成功的；因此，第四，必須在這總動員的化過程程中，將許多原先不適宜於抗戰或阻礙抗戰的制度和機構改革成爲適合總動員的性質。然後，一切國力，才可以完全集中，並發揮起來，成爲無堅不破的抗戰陣容。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各方面來講：

(一)國民救亡的基本權利，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必須政府給以保障，免得漢奸賣國賊的阻撓，以便開展民衆運動。因爲救國是人人有分的權利，國家除了國民以外，便不成其爲東西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便是這個意思。

(二)國民總動員起來，應該是包括政府中的官吏。官吏也是國民的一部份，不可特別看待。同時，離開國民及國家的利益，官吏也就不成其爲東西，而是漢奸了。所以必須首先將政府內部的漢奸肅清，以便適合民衆運動發動起來的『民權主義』的政府機構。一方面設立民意機關，集中民力民意，同時實行民主集中制，由國民大衆給最高統帥以最大的權限，以便指揮整個抗敵的機構。

(三)金融財政必須編制成爲適合抗戰的要求，不容少數人操縱，須在民衆的支持下，由政府作全力的統制，以便排除一切危機，建設戰時金融財政體

制。在金融財政的統盤抗戰機構之下，商業必須斷絕對敵貿易，必要時，由政府調整。

(四)工業的生產，必須適合抗戰的需要。一方面要勞工大眾努力生產。同時要特別改善勞工的生活，以便他們自覺地奮發，準備隨時武裝起來幫助政府軍隊抗敵。在資方應該在政府的民生主義原則之下，實行『有錢出錢』的天職，以與一切『無錢出力』的大眾「一條心」，共同擔負抗戰的使命。將一切難民安置在國營的新產業中從事生產，以增國力。

(五)在農村中，應該取消苛捐雜稅及高利貸的剝削。嚴防土豪劣紳藉口救國躲避應有救國捐，或濫派捐款。發動農民的武裝自衛力量，鼓勵生產，以保障戰時食糧及原料的供給。

(六)全國交通，應完全由抗戰的政府掌管，要跟參謀部有密切的配合，以

便臨機應變的供使用。

(七)教育應刷新，將一切不適於抗戰，或移轉抗戰目標浪費時間的課程取消，充實以救亡學識爲本位的課程，以鍛鍊一切求學青年，務使其準備爲國家的干城。

(八)文化思想必須以救亡抗戰爲主要內容。一切墮落、頹廢、消極、自私、媚敵、以及神祕的思想，務求掃除，以便集中意志，統一宣傳和教育工作。總而言之，必須以科學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爲基本綱領，配合着抗戰的內容，以便把全體國民的救亡意識，武裝起來，根絕敵人漢奸及準漢奸思想的活動。

(九)一切軍隊都要從舊時軍閥個人私有或封建割據的情形之下，改變成爲國家的正規武裝勢力。加強軍隊的政治訓練，配合民衆武裝，以補助軍隊的戰

圖力。軍餉應由國家統籌統發，一律平等待遇。特別要保障戰士及傷亡殘廢者的家屬生活。

總括地說來，必須將上述各項充分加以改革，使其成爲適合抗敵救亡的要求和使命。所以，要想綜合着所有的人力、財力、物力在全民救亡的總動員中，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必須要大家擔負責任，才可以實現的。

二 怎樣鞏固統一戰線？

最後，剩下來問題，就是怎樣叫大家萬衆一心的來擔負這總動員的責任。我們以爲：第一須由掌握國家大權的一切官吏與民衆都一齊有犧牲自己、爲民族國家而奮鬥的決心；第二應該從大家所特有的正常要求，發動起來，配合在總的抗敵救亡的目標之下，使一切不相同的國力，編制成爲統一抗敵的陣

線。爲要促成這兩件事情，唯一的辦法，是在軍事外交上堅決地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鬪爭。一點也不能軟弱，軟弱就會影響到國民的總動員，甚而給漢奸以活動的機會。

我們必須記住，漢奸是國民救亡的最大的阻礙。中國的是否有救，就要看漢奸是否掃除得乾淨。漢奸勢力一增大，國家的危機就加深。漢奸的勢力一削弱，國家就有挽救的希望。因此，我們在整個救亡運動的總動員中，在任何情形之下，任何部門中，都要展開除奸運動的鬥爭。我們可以說：一切直接間接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破壞統一戰綫與持久抗敵的，都是漢奸。根據這一原則，我們可說：凡是玩忽救亡運動，阻撓總動員，投機取利，營私舞弊的人，也是漢奸。總而言之，在全民總動員中，必須一切國民，都站在自己崗位上，厲行除奸運動。在除奸運動中，一切受不了批判的人，要不是特別愚

魯小氣，便是放棄國民天職的。一切努力爲國奮鬥的戰士們，愈是被批判，他就愈加進步，他的正確工作和思想，便愈加發生影響，因而他在救亡組織上，愈加享受榮譽和大衆的信任。

在這偉大的全民救亡的時代中，一切的國民，都有義務、督促和完成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

就整個中國看起來，只要國民在這民族救亡的時代，擔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展開抗戰與除奸的運動。那麼，在國家危機的解除的過程中，同時就創造了新的政治經濟基礎，新的國民的基礎，和新的文化思想。這些，便是創造『民治民有民享』的新中國的主要條件。所以，孫中山先生指示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是不可分開看的，它是弱小民族的中國民族解放的革命指針。覺悟的同胞們，不但應該理解這一革命的理論，不但應該防止

一切曲解這一理論的傾向；而且應該站在科學的、歷史的、正確的、觀點，在實踐中展開進行這一理論。

五 全民救亡的戰爭與世界和平運動

我們單祇是曉得在救亡運動中，要團結全體國民，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這還不夠。因為，我們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許多政治問題，都跟世界大勢，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世界與中國的救亡運動之間的關係。

現在，我們沒有很多的篇幅，來詳盡地分析世界大局。但從世界的主要運動大勢，來理解到中國的救亡運動，至少是很必要的。

我們的救亡運動，主要的是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但從世界的意義上說來，這又是為世界和平而戰爭。那麼，究竟是怎樣把這兩個意義統一起來呢？這是每一國民所應弄清楚的問題。把這問題弄清楚以後，我們不但可以了解戰爭

與和平，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對立和統一的基本關係；而且還可以很正確地，運用外交政策，在世界上，爭取一切援助或同情中國救亡運動的勢力，在我們這一邊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一 戰爭呢？和平呢？

歷史從一種舊階段，跳進新階段的時候，人類不能不選擇自己的路線：要追求新的世界，就要前進；要留戀舊的制度，就只有衰落。數年以來，歐洲和遠東的法西斯帝國主義者，有加無已的進行宰割弱小民族，並進攻和平的國家。由宣傳到組織，由準備到實行，毀滅人類文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惡潮，已經激盪到大家的眼前了。在全世界人類中，除了少數金融資本大王、大地主、大軍火商人，及野心的軍閥政客，是在爲着名利，而趕造戰爭，積極進行

侵略的工作之外，廣大的愛好和平者，及勞動大眾，都一天一天的警覺起來，爲和平與自由而反對戰爭，惟恐被戰魔損害了自己的生存權利。同時中國民族自『九·一八』以來，被日帝國主義積極進攻的大禍，日益嚴重地臨到了『最後的關頭』，四億五千萬同胞，唯一的生路，便只有發動全民救亡的神聖戰爭。否則，就只有屈辱到底，做永遠的亡國奴。在這國內外環境緊急的逼迫之下，我們如果不孤立地觀察自己民族在世界上的重大使命，如果要想正確的找到中國生存的大路。那麼，就只有一方面從世界的和平與正義，加緊擴大反侵略戰爭的世界和平運動；同時從自己的迫切利害，展開全民救亡的神聖戰爭。

有人說：『一方面高喊擁護世界和平，同時又要發動全民救亡的戰爭』——『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吧嗎？』『既然要和平，就應該反對一切戰爭；如果要戰爭，就談不到什麼和平——兩者是不能同時兼顧的』。

這種見解，在一般學究先生或左傾空談者發揮宏論的時候，特別流行。他們把戰爭與和平的兩個名詞，從社會關係及政治經濟關係中孤立起來，看成絕對相反的東西，有時竟然神祕化起來，弄得莫明其妙。結果，他們時常顛倒是非，淆亂事實，乃至出賣民族國家，葬送了自己在現中國和世界上的生存意義。老實說，這種糊塗思想，曾經是一部份漢奸用來作為幫助日本帝國主義麻醉中國人，阻撓民族解放戰爭，搗亂中國外交政策的符咒。

現在，我們首先要問：究竟戰爭與和平，是誰的要求？中國與世界是不是完全絕對孤立的？在這中間，是不是有具體的事實聯系着的？它們之間的變動，是不是互相影響着的？這是我們應該馬上就弄清楚的問題。唯有把個人、民族、國家、以及世界政治的關係，弄清楚以後，對於這些問題，才可以不生疑問，才可以決定我們救亡運動的方針及國際政策。然後，民族解放的前途，

才可以光明正大的擺在我們的面前。

二 對於曲解戰爭與和平的理論的檢討

人們如果要在半空中議論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不問他們的作用如何，如果不確定一種正式的立場，不問時間與地點的關係，或只講字眼子；那麼，對於這兩個名詞，的確很容易淆亂、顛倒，甚而麻醉人。譬如，莫索里尼用毒瓦斯大砲轟擊阿比西尼亞，本來是一種侵略戰爭。但他却宣佈說，他是在『宣揚文明』，『征服阿國的野蠻人，維持非洲和平』。又如，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他却說是在『維持東亞和平』。甚而有一部份不抵抗主義者及漢奸們，更附和着敵人，一方面說是『爲了和平，不能對日抗戰』，另一方面又說：『中國本性和平，不能抵抗』。但是，這種對於『和平』的解釋，正是和法西斯帝國主義者，用

以掩飾侵略戰爭的詭辯，是一樣無恥的說教。再如，希特勒整軍經武的出兵萊茵河，破壞歐洲的各種和平條約，時時刻刻都在陰謀合併奧國，進攻烏克蘭以及各鄰近的和平國家。但是，却有御用的新聞記者主張：『希特勒是在維持歐洲的和平。應該把諾貝爾和平獎金給希特勒。』這更是滑稽！像這些從侵略者戰魔口頭喊出來的『和平』，是連三歲小孩也欺騙不了的事情。難道我們還不懂得嗎？侵略者的屠殺，與不抵抗主義的奴隸們，同時是把『和平』這一名詞用來掩飾自己的污點的。因為，他們都是離開人類的實際社會關係，拋開了廣大的人民大眾及弱小民族，必然是要胡說霸道的。

此外，有一些空談家，他們受了侵略者或假和平的宣傳，不肯或故意不探究現代世界政治的根源，只是直覺地、膚淺地、發出相反的論調說：『和平是幻想』，『一部歷史都是鬭爭史』，『人類那一天不在戰爭中討生活』？『和平是

維持現狀；統治者才需要和平』，『和平是戰亂、鬭爭、革命的反面』，『和平對於被壓迫者說，就是不變動地壓迫、剝削之別名，就是反對戰爭。如果不甘壓迫、剝削的，他一定主張鬭爭，主張革命，主張推翻被壓迫的現狀，而不需要安於被壓迫的和平』。像這種空談名詞，咬文嚼字的觀念，根本以為『和平』是歷史上的落伍觀念。其實完全謬誤。因為，人類在歷史生活過程中，一切的文化，都是在和平與戰爭交互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這些空談家硬要截然把和平認為是壞的；那麼就只有盲動或亂幹，甚而否認了『革命就是為爭取真正和平』的真理。因此，他們便很容易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他們說：『蘇聯是在發揮它的民族自衛主義。蘇聯倡導的和平運動，對於需要發動解放戰爭的弱小民族，沒有好處，只是一種自私的政策』。並且說：『蘇聯勞動大眾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愛好和平，對於他們自己，雖是必要，但對於弱小民族的中

國，却是不必要的。中國需要的是戰爭」。這種見解，居然把蘇聯與全世界爲和平而奮鬥的友人，一齊看如侵略我們的敵人一樣的可怕。那麼，根本就把中國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政策，背叛了。拋棄國際間的一切同情，把中國孤立起來，這簡直是日本帝國主義所高興的事情。所以，機械論者們的理論，正是漢奸所藉以出賣中國的把戲！

看吧！目前最緊急的局勢，就是日本滅亡中國的危機，日益加深，歐洲與遠東的侵略國，積極地佈置同盟的陣綫。日德協定，日德防共同盟，及日德意防共公約，都先後簽訂了。牠們之間的交換條件，是日德兩國承認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德意承認日本所製造的滿洲偽國，並在國際間阻撓中國救亡抗日的戰爭的發展。而且，日德意國三一齊承認西班牙叛軍的法西斯政府。全世界人士，誰都深感到侵略者對於和平國家的進攻，對於弱小民族的宰割，及民主

自由的剝削……這種險惡的國際侵略陣綫，比洪水猛獸的大禍，都還要可怕。這種大禍，是不分區域的向任何全世界和平人士進迫着的。這是一切愛好和平的人類，所一致痛恨和反對的。

然而，空談家或侵略者的間諜們，都無恥的擅作聰明，顛倒是非。其所得結論，將爲無情的事實，給予粉碎。因爲，他們的理論的特質，是從少數特權者剝削者的立場出發的。他們的觀察方法，是只顧到現象，不管真實的事實本質；忽視了全部全世界的聯系性，只顧到局部現象的。現在歷史的偉大場面，急遽的發展着，必須我們要有偉大的進步的眼光，拋開偏見，才可以趕得上大衆所要求的真理！

三 救亡抗戰就是爭取徹底的世界和平

單祇是說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世界和平運動，應該聯成一條戰綫，還是不夠的；主要的是要討論怎樣展開這一條戰綫？

假如用祈禱上帝保佑和平的方式，向侵略者哀求，或一味不抵抗的退讓，那就不是和平運動。而是奴隸似的投降運動。這種軟弱的祈求，在一個人對於他們的朋友或父母面前說話，也許多少有一點效力。但是，在無情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面前，這種哀求，確是一種幻想。

因為，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特質，就是崩潰中的資本主義的組織：第一，它是採用非常暴力的手段，維持垂死的剝削制度；第二，絕對地壓制勞動者的解放運動；第三，欺騙國內大中小資產階級幻想新殖民地可以解除他們的破產和窮困，鼓勵向外侵略；第四，掛起優等民族向外侵略的旗幟，盡量使恐慌中的國民經濟，轉變成軍事化的組織，驅使貧苦勞動者和士兵去充當炮灰，向弱小

民族及和平國家進攻。這種法西斯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惡潮，在資本主義經濟
特種蕭條的階段，特別嚴重。誠然，在世界各法西斯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利害矛
盾，是在隨着戰爭危機逐漸加深。但是，在發動侵略戰爭這一點上，它們確是
一致地震動世界上任何角落的。

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大眾，因不堪生活壓迫，而反對剝削制度的要
求，十分迫切。它的努力，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比從前的要雄厚。但是，資
本家的鎮壓方法，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厲害。不過，人類未必就甘心永遠
忍受，或等待着在這黑暗時代受活罪。這可怕的罪惡生活，就是侵略者的非法
壓迫與進攻所造成的戰禍，這是維持現有不平等的、剝削制度的孤注一擲的把
戲。

反之，全世界反戰的和平運動，是使少數特權者侵略者陷於孤立的唯一政

策，是可以使侵略戰爭遭遇着致命打擊的障礙。我們可以從許多公開的報紙上，知道：意大利的士兵，曾經有無數次的投到阿比西尼亞人那邊去。日本軍隊裏發現許多次的反對侵略中國的傳單，而且他們曾經有士兵帶着食糧槍彈，加入滿洲的義勇軍。德國勞動大眾及婦女反對希特勒的組織，隨着備戰的狂熱，而迅速地祕密地擴大了反戰的運動。蘇聯勞動大眾的國家，因建設與民主政治的成功，而與法國、捷克、羅馬尼亞、巴爾幹、近東及波羅的海一帶，以及美洲的弱小國家，都在互不侵犯的原則下，締結了各種的友好或互助條約。甚而澳洲及遠東各弱小民族，也積極的提倡建立太平洋各國互不侵犯公約，完成集體安全制度。連向來主張維持現狀的英帝國，也因爲不願馬上遭受戰禍的恐怖，在一九三六年與蘇聯締結了遠東海軍協定。幾個月以來，英、美、法三國反法西斯戰爭的貨幣經濟合作，也表現着維護世界和平的大趨勢。尤其是最近

中國全民救亡抗戰發動以來，世界上援助我們的一切力量，都是從世界和平立場與人類平等的正義出發的……總而言之，一切反戰的和平運動者，不問他的動機和境遇怎樣，在這戰禍臨頭的時期，大家都可能結合成一條戰綫。這和平戰綫，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世界和平大會中，曾經表現得很具體，表現着世界各國民衆的實力的鬥爭力量。它在全世界勞動大眾，反剝削制度的運動的政策上，是拉攏同盟軍，保障最後勝利的唯一條件。它對於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更是直接保障勝利的唯一條件。在這樣局勢之下，弱小民族的解放戰爭中，一切軍閥、官僚、爭權奪利的國內戰爭，也都不被停止下來。所以，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

中國民族救亡抗戰的展開，就是擴大國內外的和平運動的實踐！同時，積極地擴大，並充實世界和平運動的內容，就是保證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

主要條件！

這個用統一的眼光，觀察中國與世界的光明之路的理論，指示着我們：應該動員全國同胞，在全民救亡的戰爭中，必須與世界的和平勢力，及革命勢力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